

## 绪论 黄兴与日本

黄兴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推翻清朝封建君主制度 建立民主共和国 振兴中华 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的一个特点是皆与外国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早期都留学国外，其民主思想也来自国外，从国外吸取了新的革命思想，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展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其次，他们在国内的革命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后，在国内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流亡国外策划新的起义，寻机从国外打入国内再次发动起义。于是形成从国内到国外，从国外到国内，再次从国内到国外的反复过程。孙中山、黄兴皆如此。

孙中山在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十七年半之久，其中在日本九年半（占 54.2%），在欧美五年半（31.4%），在南洋两年半（14.28%）。黄兴则在十五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八年两个月，其中在日本五年半左右，在美国一年九个月，在南洋十一个月。孙中山与黄兴相比较，孙在国外占革命生涯的 58%，黄则占 54%，大体相同。其中在日的时问，孙占 54.2%，黄则占 67.4%，黄比孙多 13.2%。孙中山进出日本十六次，其中八次是在日本长期居留时临时进出的。黄兴则进出九次，没有孙那样长期居留时期的临时进出。

这仅仅是数字上的比较，但也说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同孙中

山与日本关系有共同之处。但黄兴的革命生涯比孙中山短一半，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虽然与孙中山并称，但位于孙之后，且在革命党的外交活动中远不及孙中山。因此，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呈现出与孙日关系不同的特色。但这一特色是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和日本的诸关系的普遍性中的特色，特色中包含着其普遍性。下面将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分成五个时期加以论述，同时，适当比较黄兴和孙中山的对日关系的异同点。

## 一、同盟会成立前后时期

近代中国青年接触和学习外国，都通过留学。孙中山留学美国，黄兴留学日本。两者留学地点不同，但追求的都是欧美的近代文明和近代民主思想政治，希望以此改造中国。黄兴于 1902 年在两湖书院读书时被张之洞选派，东渡日本 6 月初入东京的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宏文学院留学的整一年中，黄兴做了三件事：一是与杨笃生等人创办《游学译编》任该刊教育栏译员。翻译了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彦著的《学校行政法论》连载于该刊第二至四期。这一工作对黄兴来说是学习和研究日本近代教育的机会。日本维新后大兴教育，实行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可谓采取教育兴国的方针。中国近代新教育深受日本影响，不少教师来自留日学生。黄兴说“夫欲谋国家之发展 莫先于教育”主张“自宜竭尽全力运筹 而以国家资财充其经费”<sup>①</sup>。他还主张“学以专而精，以久而成 增长年限亦其要点”<sup>②</sup>。他举日本把四年义务教育改为六年来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些言论和主张表明，黄兴的近代教育思想是在受日本近

① 湖南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29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代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二是在宏文学院学习时，黄兴极留意于军事技能之学习，课余听日本退役军官的讲授，暇则参观士官联队的各种兵操，每日早晨去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这对其后黄兴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指挥技能无疑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黄兴提倡军事教育，认为‘中学而上 令学兵学二年 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 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矣’<sup>①</sup>。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沙俄继续霸占东三省，拒不从东北撤兵。黄兴与留日学生于 1903 年 4 月在东京组织拒俄义勇队，由黄兴给义勇队教授枪法。后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三是经一年留日实践，黄兴决心投身于反清革命，迈开革命的第一步。1902 年留日学生 608 人，1903 年猛增到 1300 人。他们在日本组织各种爱国革命团体，创办众多期刊杂志，出版革命书籍，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组织爱国革命活动。黄兴参与这些活动，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这促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黄兴与日本发生关系的起点。

1903 年 5 月 31 日 黄兴毅然回国，一面在明德学堂、经正学堂、湖南实业学堂、湖南国立第一女学任教，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同年 11 月 4 日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翌年 10 月策划长沙起义，但事泄失败。起义虽失败，但这是黄兴等策划的第一次革命起义。他愈挫愈奋 坚韧不拔 直至革命成功。

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逃往上海租界，再谋起义，但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连入狱。获释后，于 1904 年 11 月第二次来日。此次渡日与上次不同，不是来留学，而是将日本作为革命基地，大力开展反清的革命活动。从此，日本在黄兴的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黄日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此次在日活动有两大事：一是与宫崎滔天等大陆浪人和声援中国民主革命的民间人士相识，开始得到他们的声援和支持。宫崎滔天是属于自由民权派的

《黄兴集》，第 295—296 页。

大陆浪人，与国粹主义大陆浪人不同，曾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在思想上与黄兴等有共鸣之处。当时宫崎是以说唱浪曲为生的平民，但他具有民主思想。他在黄兴与孙中山的相识、孙中山革命运动与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乃至同盟会的成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然，黄、孙、留日学生这三者的结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宫崎的存在和居中活动起了促进的作用。宫崎于 1897 年在横滨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 思想共鸣、肝胆相照 结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从此，他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亲身参与了支援菲律宾独立运动、两广独立运动、惠州起义等革命活动。他将自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成文 自 1902 年 1 月 30 日至 6 月 14 日连载于当时较为进步而发行量在亚洲最大的《二六新报》，共连载 123 次。同年将它编辑成册为《三十三年之梦》，8 月由东京国光书房出版发行。该书颇受日人和留日学生的欢迎。同年 12 月发行了第八版。在中国 全一（全天翻）将它译成为《三十三年落花之梦》，1903 年由国学社出版。另一个版本由黄中黄（章士钊）于 1903 年译成《孙逸仙》作为荡虏丛书的一分册来出版。此书分量不大 仅为《三十三年落花之梦》的五分之二。如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作为介绍和宣传孙中山的第一本书的话，《三十三年之梦》则为宣传孙中山革命运动的第二本书 其影响远远大于《伦敦被难记》。宫崎滔天写的《三十三年之梦》系日语 文字半文体 留日初学日语者皆不易读。因此留日学生读的多半是全一和黄中黄之译本。这一书不仅介绍和宣传了孙中山其人和他的革命论，而且给读者以革命勇气。由于此书，宫崎滔天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和威望加大，黄兴和留日学生纷纷登门拜访宫崎<sup>①</sup>。黄兴与宫崎初次见面的日期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 两者是通过《三十三年之梦》相识并结成知音的。

<sup>①</sup>《宫崎滔天全集》第 4 卷 平凡社 1973 年版 第 299 页。第 5 卷 第 511 页。  
毛注青编《黄兴年谱》认为是 1902 年下半年或 1903 年上半年。

黄兴与孙中山是在近代中国民主运动中并称的领导人。这两位领导人的相识与结合，有它的必然性，但宫崎滔天在其中起了桥梁和促进作用。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周游欧美后回到日本。此时宫崎向孙推荐黄，并陪孙来东京与黄面晤。这是两位伟人的初次见面，这次见面促进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的结合，这一结合促进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黄兴是在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领导人之一。这虽与黄兴本人的思想、革命经历及组织能力有直接关系，但也不可忽视宫崎滔天等众多日人的支持和协助，也不能无视日本政府间接地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并默认了在日本成立这种革命团体的活动。这是黄兴与日本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

黄兴与日本关系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4月广州起义时期。这时期孙、黄的主要任务和活动是筹集军资和军械，发动西南和华南地区武装起义。黄兴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围绕这一革命任务和革命活动展开的。这时期，黄兴进出日本五次，在日两年七个月。1907年黄兴来日两次，这是1902年初次赴日以来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日本警视厅和外务省从这一时期开始侦察、跟踪黄兴。同年5月27日在警视厅和外务省档案中第一次出现有关黄兴举动的简报。接着6月18日第二次出现离日赴港之简报。该简报写道：黄兴于6月13日离日赴港。黄赴港后又转入钦州，策动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和12月的镇南关起义。据宫崎夫人槌子回忆，黄兴离日时带走手枪300支、日本刀70把<sup>②</sup>。这时黄兴得到日人宫崎滔天、三上丰夷、萱野长知的协助。1907年9月宫崎和三上租用幸运丸（2800吨），将在日购买的步枪2000支和手枪30支送往在广东省汕尾策划起义的许雪秋。但在汕尾海面

《关于清国亡命者》乙秘第707号，1907年6月1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年版，第514~515页

被清军发现，把军械扔入海中。这些军械是在日借债购入的。1908年夏天，黄兴来日后，债主登门催债，他为避债，在宫崎宅隐藏了五十余天。

这时期，孙、黄虽然从日本购买了军械，但这是与军火商间的交易，而不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支援。因为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肃清王的要求，劝孙中山离日，所以这时日本政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1907年春天日本政府劝孙中山离日后，不许孙再回日本，但对黄兴尚未采取这种措施。于是，1907—1908年西南边陲的起义相继失败后，黄兴于1908年夏天由新加坡经香港又回到东京，这是第六次来日，在日一年半，是最长的一次。此时东京同盟会组织涣散，意见分歧，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章炳麟等又攻击黄兴等在西南的失败，革命形势显然陷入低潮。而且日本政府从1908年开始对黄兴的举动严加监视，各地警察和地方政府遵照政府之令，跟踪黄兴及支持革命党人的日本友人及大陆浪人的活动，因此在日本的档案中有关黄兴的材料屡见不鲜。这说明，经西南地区的起义，黄兴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因而日方也加强了对黄兴的监视。

这时期，日本对黄兴等革命党人监视的目的是：及时掌握他们活动的动向，以便把握对他们采取对策的主动性，使他们在日的举动不至于影响日本的对清外交。如前所述，这时期日本力图改善与清政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驱逐压制革命党人的要求，但又不肯也不必彻底镇压他们，同时还把他们当作一种潜在的势力，允许除孙中山之外的革命党人继续留在日本。

但革命党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是较难的。黄兴于1909年春说：“此时”在日本完全不能从事革命运动，其理由有三：（一）日本政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111页。《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689页。

府之保全清政府政策(二)警察之严密取缔(三)在日同志操节薄弱。其中,第三点颇令人痛心”<sup>①</sup>。在日同志是指在日的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等。在日革命党人的涣散情况,在前已述。对留日学生,黄兴也不抱多大希望。黄兴说:“留日学生大致抱有归国后当官之希望,不能称他们为革命之友”<sup>②</sup>。因此,黄兴此时对张之洞、袁世凯等抱有希望。此时,清政府内部满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大。1907年5月,黄兴想利用这一矛盾,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他说:“在国内的友人及其他革命党派正在等待时机。例如张之洞,预测清国革命早晚难免,他企图反抗现政府之际,即我得以实行革命之时。张之洞果然作这一反抗,其益友袁世凯亦将随之举反旗”<sup>③</sup>。不过,张之洞没有造清朝的反。可是到190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是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清廷内部权力之争白热化。袁世凯预感“天祸”即将降临,力图采取对抗措施。袁企图与革命党人联络,增强自己的势力。黄兴对光绪帝和西太后死之后的北京形势有所估计,他说:“北京政府若有动摇,必生一大事变,果尔,则对我党有直接影响”<sup>④</sup>。据宫崎滔天之记述,袁密派使者程家桢到京都。黄兴接到从京都发来的电报后,1月1日启程赴京都,与在那里的程家桢、宋教仁商议联络袁之事<sup>⑤</sup>。但此时北京形势剧变。1月2日摄政王载沣策划,以袁“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为借口,让他解甲归田。袁1月6日仓皇出京,回河南老家,袁势力急转直下。袁电程:“万事均为时已晚,速归”<sup>⑥</sup>。此故,黄兴和袁相互借用对方势力的计划和设想都变成泡影。可是,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东山再起,

<sup>①</sup> 《清国革命党人之谈话》,乙秘第963号,1909年3月25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sup>②</sup> 《清国亡命者之言论和行动》,乙秘第528号,1907年5月27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同上。

李云汉编:《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1973年版,第137页。

<sup>⑤</sup> 《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03—304页。

<sup>⑥</sup> 同上。

重任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掌握清朝大权，与南方革命势力进行南北议和。他借助革命形势，迫使清帝退位，称为临时大总统，君临于神州。这并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时期南北议和，实质上是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方的袁世凯之间的较量，也是相互利用对方势力，以达各自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渊源便在这一时期。从此种意义来说，黄兴借助袁势力的幻想变成事实。

联袁未成后，黄兴致电宫崎滔天来京都。宫崎 3 日离东京赴京都。黄对宫崎说：“万事均为时已晚，无法进行”<sup>①</sup>。既然如此，黄兴和宫崎决定去九州鹿儿岛，参拜西乡隆盛的墓。他们先到神户，从三上丰夷处借旅费 300 日元，11 日抵鹿儿岛。黄兴参拜西乡墓时挥笔作诗：“八千子弟甘同冢，世事唯争一局棋。悔铸当年九州错，勤王师不扑王师。”

回途，12 日到熊本，去宫崎老家荒尾村。13 日晚抵长崎。在长崎先后访问了《东洋日出报》的记者福岛熊次郎和酒井泉，《长崎新报》记者山本彦郎，《九州日出报》主编岩永八之丞。长崎的警察侦探两人的行踪，但未发现异常，从岩永处“仅得此时非举事之时机”<sup>②</sup>之情报。

1 月 18 日下午，黄兴和宫崎抵下关。19 日中午抵神户，投宿于站前的吉田旅馆。他们拜访三上丰夷两次，并谈了今后的革命计划：“我革命党在最近之将来将演出惊天动地之重大活动，但现在尚非其时机。吾党正致力于先召集留学美德两国的多数学生，并渐次在陆军内扶植势力，等待内外呼应，颠覆现政府之时机。在海外之留学生致力于鼓吹党之宗旨，并在便利之际，断然在边陲之地举义，以此使国民有志加入革命党，并在陆军内部发展势力。如此，一

<sup>①</sup> 《宫崎滔天全集》第 4 卷 第 303~304 页。

<sup>②</sup> 《黄兴集》第 8—9 页。

<sup>③</sup> 1909 年 1 月 19 日长崎县知事荒川义太郎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清国革命党员之来去》高秘第 28 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朝举事 便可内外呼应 变敌之军需为吾党所用 以此持久’<sup>①</sup>。

1月20日，黄兴偕宫崎离神户，经由大阪和京都 22日晚回到东京。他们离神户去鹿儿岛时 是从三上宅后门偷偷走的 因而，甩掉了尾随之警察。但回来时则完全不同。从黄兴和宫崎抵鹿儿岛开始至回到东京的十几天，日本警察一直跟踪，侦探其行踪。

2月5日 宫崎又去神户访《神户日报》主编国木田收二尾崎行雄的弟弟尾崎行昌（大阪商船会社职员）和尾崎行武。宫崎来神户之目的不明 但他透露：“孙逸仙之密使 某清国人 将从新加坡来东京，但未带立即举事之使命，在东京的同志仅服从孙之指挥亦尚非时机。”<sup>②</sup> 宫崎夫人回忆九州之行时说：“设法银根”<sup>③</sup>。

综上所述，黄兴和宫崎的鹿儿岛之行，似乎是一次旅行，途中对日本友人谈了革命党的近况及今后计划，联络同志。至于革命党的现状和今后计划，正如沿途所谈的那样，等待时机，无举义之计划。黄兴本人也说：“在日本完全不可能从事革命运动。其理由有三（一）日本政府之保全清政府政策（二）警察之严密取缔（三）在日同志操节薄弱。其中 第三点颇令人痛心。”<sup>④</sup>这番话再次证实了黄兴在日等待时机的实际情况。这一“在日同志”是指在日的革命党人。此时章太炎等在东京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内部矛盾激化 组织分裂 无法展开革命活动（第一、二理由 已在前所言 无须再述。但各地的工作并未停顿。1909年10月 胡汉民等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统筹南方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策划广州新军

① 1909年1月22日 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清国革命党员之来去》 兵发秘第2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② 1909年1月23日 警视总监龟井英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宫崎虎藏和黄兴归京之事》 乙秘第2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 第303页。

④ 1909年2月16日 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关于所需监视人宫崎虎藏之行动》 兵发秘第51号，日报外交史料馆藏。

李云汉编：前揭书，第140页。

⑤ 《清国革命党人之谈话》，乙秘第963号，1909年3月25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动的第一次新军起义。该支部邀请黄兴来港主持起义军事。黄兴于 1910 年 1 月 23 日离东京赴港，主持起义军事，但没有旅费和军事资金。萱野长知致函神户的太田信藏，请他设法筹集。黄兴持函到神户找太田时，太田已赤贫如洗，无可奈何。太田找其兄中岛胜次郎帮忙。中岛是小企业家，与黄初面，但慷慨解囊给黄提供了旅费和军费若干，并在神户常盘花坛设宴欢送黄兴<sup>①</sup>。黄兴离神户前致函萱野长知，告以“此次前途元气甚旺，如能得手，万事可弃，兄当速来助我”<sup>②</sup>。黄于 1 月 29 日抵港，2 月 4 日致函宫崎，说“革命军不日大起，人材缺乏，乞速召集步炮工佐尉官多名前来助援，不胜感禱”<sup>③</sup>！这表明黄兴在策划此次起义时，期待日本的援助。

这次起义原定 2 月 15 日发动，但因兵卒与巡警之冲突，提前三天爆发。黄兴在港得知这一情况后，急欲前往督战，但措手不及，起义宣告失败。但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此次起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动的第一次新军起义，反映了革命运动的新趋势。这便引起日本军部的重视。此时在桂太郎内阁任陆军大臣的寺内正毅大将通过长谷川好道军事参议官的介绍和推荐，派宫崎滔天、儿玉右二赴港调查革命党人的这一新动向。宫崎偕儿玉右二（《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于 4 月 22 日离东京，经神户于 5 月初抵港。此时宫崎自称《万朝报》记者在港与黄兴晤谈数日。知音相见，格外亲热，推心置腹地谈了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首先谈的是 4 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长沙数万群众为生活所迫，奋起捣毁粮店，焚毁巡抚衙门和外国洋行及教

①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 1970 年版。第 359～361 页。

② 罗家伦主编：《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 台北 1973 年版 第 70 页。

③ 同上书 第 73—75 页。

堂。宫崎问长沙“抢米”风潮与革命党的关系。黄兴极力说明该风潮与吾党没有关系，吾党制止革命党人介入此类风潮，说明革命党与那些贫民的不同之处。其次，1910年4月汪兆民等在北京图谋暗杀摄政王载沣之事。汪等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提倡暗杀活动。黄兴说，他们事先与我们没有商议，他们的行动违背了吾党的方针，并深表遗憾。再次，广州新军起义。黄兴谈了此次起义爆发的经过，说明失策之处。接着谈了革命党与军队的关系。黄兴谈了从1905年5月萍乡、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至1907—1908年西南边陲起义与军队的关系，以及4月安徽军人骚乱。黄兴说“这对吾党来说实在是一大进步，吾等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既不悲观，反而颇为乐观，其所以就在此”<sup>③</sup>。黄兴满怀信心地说，“吾党通过前次失败大有觉悟，知道了非常慎重地准备之必要，今后不会有过去那样的惨败”<sup>④</sup>。黄兴通过此次晤谈不仅介绍了革命党的革命方针及现状，而且表达了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

宫崎于5月17日回到日本。他将与黄兴谈话的部分内容以《革命党领袖黄兴——于热带之地》为题，发表在6月15日发行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将中国革命党的革命方针及状况介绍给日本读者。

黄兴也于5月13日致函孙中山，及时向他汇报了宫崎和儿玉来访情况，并言及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争夺革命党可采取的方针。从这一汇报和对宫崎的谈话中看出，黄兴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政府改变对革命党的政策，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

1910年6月7日，黄兴从香港秘密抵东京。这是他第七次来日，停留一个月又十天，是停留最短暂的一次。此次来日的目的是，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513—514页。

同上书，第515页。

同上书，第516页。

同上。

《黄兴集》第21—22页。

在日与孙中山会合，共商起义大事。孙中山于 1908 年西南边陲的起义失败后，经新加坡和欧美大陆，于 1910 年 6 月 10 日抵达横滨。孙此次来日的目的是在日本策划和组织南方沿海地区的革命活动。孙在美国结识《无知之勇》的著者荷马里及财界的布思与他们商议决定在南部东京湾沿海之地建立革命军的训练基地及弹药库 由美派军官训练革命军 为此由布思在美筹集 350 万美元的军费。这次孙在美国认识了容闳，他是最早的留美学生，协助孙与美国人的这一合作计划。黄兴也曾透露过“先召集留美德两国的多数学生”来准备起义的计划。由此推测 黄兴此次来日时 大概知道孙中山的这一行动计划。黄兴与孙在横滨一宿后，第二天转移到东京 准备长期居住。对孙的来日，日本外务省鉴于日清关系表示为难，但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支持孙留在日本。在东京，孙中山与黄兴及宋教仁、赵声、谭人凤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也赞同孙的计划。但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强烈要求下，令孙于 6 月 25 日之前离日。孙被迫于 24 日离东京，25 日由神户离境 前往南洋。黄兴也随之于 7 月 17 日离东京赴香港。孙、黄二人皆未达到来日的目的 这与这时期日本对革命党的政策有关。

这时期（1905 年同盟会成立之后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革命党的政策和态度，与前一个时期有变化。这集中地表现在：（1）1905 年 11 月 12 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取缔留日学生的 15 条规则；（2）1907 年 3 月劝孙中山离日；（3）1908 年 10 月 19 日下令禁封《民报》；（4）1907 年 6 月第二次驱逐来日的孙中山。这一变化与中国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系。同盟会成立后，在同盟会成员的直接领导和间接影响下，全国各地

74—79 页 参照韦慕廷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4—79 页  
年 1 月 22 日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小村外函：《清国革命党员之来去》兵发秘第 20 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的起义连绵不断。这冲击了清朝统治。于是清政府数次交涉日本政府取缔在日的革命党和留学生的活动。而日本政府为改善日俄战争后因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侵略而激化的双方矛盾，以压抑革命党和留学生的方法，向清政府献媚，以便改善与清政府的关系。二是日俄战争前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在客观上有一致之处，两者利害相同。1903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和反沙俄的潮流，对日帝的反俄外交有利。日帝为扩大在满蒙的权益，在东北与俄国争夺。1902年日帝与英国缔结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并以它为后盾，于1904年2月发动了日俄战争。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日俄正在美国进行媾和交涉，反俄的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的存在对日帝的反俄政策是有利的。但日俄订立《朴茨茅斯和约》后，日帝继承和扩大沙俄在东北的殖民权益，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在东北的权益。这便激化日帝与清政府乃至包括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矛盾。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矛头转向了日帝，清政府为对抗日帝和沙俄采取联美措施。而昔日敌人日帝与沙俄战后订立瓜分满蒙的新协约。为对付清政府和美国，昔日敌人重新结成友好关系。形势的这种变化，便影响了日本对革命党和留日学生的政策。

黄兴与孙中山的一个共同点是，革命愈挫愈奋，坚韧不拔，毫不气馁，直至革命成功。1910年11月孙、黄又在南洋的槟榔屿开会，决定翌年春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会后，黄兴一边策划起义，一边筹集军资，购入军械。为此，黄兴派黎仲实在日本购步枪628支和弹药，其总额为三万五千余银两。黄兴之子黄一欧和宫崎滔天及其内弟前田九二四郎在日购几十支手枪和万多发子弹，运往香港。这时期从西贡、香港及其他各地购进武器，但由日本购进

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5页。  
《黄兴集》第57页。

毛注青编：前揭书，第113—114页。

的占一半以上。这些武器的供应，是一种秘密的商业性交易，不表明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等率敢死队向两广总督署发起进攻，浴血奋战，但终以实力悬殊而失败。

综观辛亥革命前黄兴与日本的关系：

（一）在黄兴的革命运动中日本具有多层次、多种意义的地位。一是留学之地，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和文化之地；二是学习和训练军事之地；三是联络和团结留学生和革命同志，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四是逃避清廷镇压之隐藏之地；五是购入军械之地。

（二）与孙中山相较，黄兴进出日本较为自由，日本基本上没有阻止他入境，也没有强迫他离境。这与孙不同。日本对黄兴的监视，1907年前较为松，此后较为严密，但显然不及对孙中山。这与孙、黄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及在清廷对两个人的重视程度也有关。

（三）这时期黄兴主要与宫崎滔天等大陆浪人、退役军人和民间友好人士往来，与日本官厅及军部无直接联系。他对日本的期待也集中于大陆浪人及民间人士，尚未上升到对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期待。这与这时期的孙中山不同，也与辛亥革命时期不同。这与其在革命运动和国内外政治舞台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有直接关系。

（四）这时期黄兴对日本侵略问题已有正确的认识。1911年11月他致暹罗同志书中写道：“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对英、法、美、德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也有深刻的认识<sup>①</sup>。辛亥革命前黄兴文稿较少，言及日本之处虽然不多，但那几句反映黄兴对日的认识。对日本政府对包括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的政策和态度，黄兴也有正确的认识。1910年5月宫崎滔天和儿

① 参照《黄兴集》，第57—59页。

② 《黄兴集》第27页。

③ 同上。

玉右二来港晤谈时 他讽刺地说：“贵国（指日本——笔者）警察被评为世界第一”；与前西园寺内阁相比 现在的桂内阁更为严厉”，“若将吾等视为大人物而注意一举一动，则可产生感谢之念。但若过分则扰乱别人，相互添麻烦<sup>①</sup>。”这表明了他对日本政府和警察的反感。黄兴对日本的认识与孙中山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孙中山留下的文稿较多，言及日本的次数比黄兴多。

孙、黄对日态度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对待国内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度上。1908年初，孙中山托日本贸易商安宅弥吉从粟谷商会购枪 1460 支和子弹 94 万发 租借日商船第二辰丸 运往中国南部沿海。但该船 2 月 5 日在澳门海域被清军抓获。就此日本政府向两广总督提出谢罪、赔偿损失、惩罚官员、无条件释放该船等五条要求。两广总督接受这一要求，并释放了第二辰丸。广东及香港商界对此表示不满，以抵制日货来表示了对日本无理要求的愤慨。这一运动持续到年底，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贸易猛受损失。于是日本政府召请内田良平和宫崎滔天，让孙中山出面镇抚这一运动。孙答应了这一要求。黄兴虽然没有直接说孙，但他指责当时反对抵制日货运动的何天炯，说“失去了国内同志对他的信任，实际上现在的处境已经不佳。他用从事革命运动来施展其抱负 终归无望”并预言他将变成清政府的人。

为什么对同一问题，孙、黄之态度不同呢？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面临两大革命任务：对内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对外反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在这两大任务中，孙中山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推翻清朝统治的任务放在第一位，认为完成对内革命任务后，实现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不难完成。因此，他将反对日帝侵略的任务放在次要地位。为完成对内的

① 《宫崎滔天全集》第 1 卷 第 156—157 页。

② 参见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88—90 页。

③ 《清国革命党员之谈话》乙秘第 963 号，1909 年 3 月 25 日。

革命任务，他利用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求援于日本。孙中山对国内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度，便是他这一革命战略的具体体现。黄兴则有所不同。他有时将对外反对日帝侵略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在第二辰丸事件中他站在国内民众一边，支持反对日帝的抵制日货运动。这是孙、黄二人的革命战略有所不同而产生的现象。

## 二、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一次革命，其规模空前，革命党及其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地位也颇为提高。这一特点对这时期黄兴与日本的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赶赴武昌，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在汉口和汉阳督师。敌我间的战争空前激烈。鉴于战斗的需要，黄兴不能不求援于日本。他首先求援于日本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他赴武昌途中，致电萱野长知，让他带着大量的炸药速到武汉。萱野长知从梅屋庄吉那里拿着七万日元并借金子克己等一批大陆浪人来中国。他们在上海和武汉得到了驻在该地的参谋本部武宫本庄繁和寺西等人的协助。这表明，驻华的日本军人支持革命党的反清斗争。接着，日本的现役军人也赶来汉阳前线。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等大报记者也在汉阳采访。梅屋庄吉派摄影记者拍照汉阳前线革命军的战斗。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在日本国内组织声援革命的活动，劝日本政府支持革命党。但这时期，黄兴对日本政府和军部不仅不抱多大的期待，反而警惕日本出兵干涉革命。他对一位日人翻译波多野说，“甚为关心日本对革命军之态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第 148 页。  
同上书，第 150 页。

度<sup>①</sup>。他还坚决表示‘如外国干涉，一是在湖南，二是在广东与它抗战到底’<sup>②</sup>。武昌起义爆发伊始，日本试图出兵干涉，但因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欧美列强的牵制，未能出兵。由此可见，黄兴对日的判断和担忧是正确的。

可是，11月底汉阳的失陷关系到革命前途，对革命党和黄兴是个很大冲击。黄兴回到上海后便转变对日的态度，争取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黄兴为何改变对日的态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在汉阳，德国军事顾问亲临前线指挥清军，德国供给清军的新式武器威力大，因此黄认为在汉阳失利的原因是革命军的武器远不如清军，急切需要日本在筹资和武器上的援助。黄兴希望日本先提供步枪 2 万支，野炮 54 门，机关枪 70 余挺以及相应的弹药。但缺乏资金，未能实现。二是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对革命势力的态度发生变化，暗中予以支持。鉴于此种情况，黄兴在上海决定派何天炯前往日本。黄兴给何写了委任状：“兹因军事需财孔亟，特委任何君天炯赴东借募巨款，所有订立条件悉有全权，但不得损失国权及私利等弊。”<sup>③</sup>何带黄的这一委任状，经神户、横滨，12月11日抵达东京<sup>④</sup>。在东京，何通过有邻会访犬养毅等政界人士，希望日方提供贷款、军资、军械及防寒用具等，并请大陆浪人渡清参加革命<sup>⑤</sup>。何还请铁路工程师原口要渡清协助革命势力，并通过他向日本政府的内务大臣原敬拜托了替南方革命势力在日筹款之事<sup>⑥</sup>。原敬同意原口赴清，并赞成提供以江苏铁路（也称苏省铁路）

<sup>①</sup> 1911年11月6日，日驻汉口川岛第三舰队司令官向斋藤实海军大臣提出的清国事变警备报告要领第18次。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sup>②</sup> 《南京特派员情报甲》。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sup>③</sup> 1912年12月7日，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10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sup>④</sup> 参谋本部：《清国事变特报附录》第2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sup>⑤</sup> 《黄兴集》第96页。

<sup>⑥</sup> 自1911年12月13日开始在日本档案中有有关何天炯行动的记录。

<sup>⑦</sup> 《清国革命党员来日之事》乙秘第1917号，1911年12月13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sup>⑧</sup> 《原敬日记》第3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页。